

第四辑

宋史研究论丛

漆侠 〇 主编

CHINA

序

自《宋史研究论丛》第三辑于去年四月出版之后,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继续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在一年的时间里,又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为促进学术交流,不断提高本所的学术水平,今编辑《宋史研究论丛》第四辑。

本辑共收入论文二十二篇,有关宋代政治法律方面的五篇,经济方面的六篇,宋学方面的二篇,其他方面的四篇。随着本所研究人员研究区域的拓展,本辑亦收入了其他朝代的论文五篇。今将这些成果提供给同道们匡正。

编者

2000年5月15日

CHINA

目 录

序	漆 侠(1)
欧阳修在宋学形成中的先锋作用	漆 侠(1)
释“麀糟陂里叔孙通”	漆 侠(29)
略论宋朝法律文化特征	郭东旭(32)
论北宋“贼盗”重法	郭东旭(57)
论宋夏战争	李华瑞(74)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状态的转化及其影响	陈 峰(87)
宋代皇族谱牒考述	王善军(99)
北宋青州麻氏家族的忽兴与骤衰	王善军(116)
试论辽朝对北宋制夏政策的影响	李华瑞(128)
宋代榷货务的金融职能和性质	姜锡东(142)
宋代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	姜锡东(150)
宋代矿冶业机构官员的除授制度	王菱菱(168)

再论宋代金银矿业发展的社会因素	王菱菱(191)
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	高聪明(218)
货币在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高聪明(238)
元朝农田水利的恢复与发展	高树林(250)
元代官营高利贷资本述论	刘秋根(263)
论元代私营高利贷资本	刘秋根(275)
中国古代合伙制下盈余的分配	刘秋根(294)
关于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几个问题	刘秋根(308)
《宋史》天文志、五行志校读札记之二	高纪春(323)
读“宋史”列传札记	高纪春(332)

欧阳修在宋学形成中的先锋作用

漆 侠

一、北宋初文风的巨大变革、 欧阳修在变革中的作用

文自咸通后，流离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高公在紫薇，滥觞诱学者。自此遂彬彬，不荡亦不野。^①

这首诗是王禹偁的五哀诗之一，用来纪念高锡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这首诗还告诉人们，自从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大力变革文风，但是到唐懿宗咸通（860—874）以后，文风又滑向了此前祖尚四六、专务华靡的老路，“秉笔多艳冶”即是指此而言的。文风变革之所以如此艰难，传统习惯势力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隋唐科举以诗赋抡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不能不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何况皇帝制诰照例使用骈体，以至于汇集而成的文风只凭少数几

^① 王禹偁：《小畜集》卷四《五哀诗》第二首《故尚书虞部员外郎贬莱州司马渤海高公（锡）》，四库影印本 1086—27。

个人是难以遏止的。只有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社会上越来越知道这种文体的无益,文风的变革才能够有所成功。

北宋首先向晚唐五代“薄弱”的文风提出挑战的是柳开,所谓“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者是也^①。柳开在其启蒙教师指引下,率先开始了对韩愈文的研读,而在那个时候,“天下无言古者”^②。但是,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起着重要作用的则是王禹偁而不是柳开。已故的陈植锷同志在《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宋初诗风续论》等文中,对此问题作了确切明白的说明,兹不多论^③。

王禹偁(983—1031)济州巨野人,出身于社会下层。王禹偁之所以成为宋初杰出的文学家,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他的诗文是在他的高明的文论指导下形成的。在《送孙何序》中,王禹偁批评了当时萎靡不振的文风,认为应从根本上进行变革:

咸通以来,斯文不兢;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国家乘五代之末,接千岁之统,创业守文,垂三十载。圣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兴矣。然而勤服古道,鑽仰经旨,造次颠沛,不违仁义,拳拳然以立言为己任,盖益鲜矣!^④

王禹偁之所以反对当时的时文,就在于这种文体下的空洞无物,所以他提出了“立言为己任”这一远大目标,同时要求:不论碰到任何情况,不能违背儒家的仁义之道!在《送谭尧叟序》中,王禹偁一再强调了这个问题:

①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四部丛刊本。

② 柳开:《河东集》卷二《东郊野夫传》,四库影印本 1083—245。

③ 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1983年第1期。

④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四库影印本 1086—86。

古君子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重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科试以来，此道其替，先文学而后政事故也。然而文学本乎六经者，其为政也，必仁且义，议理之有体也。文学杂乎百氏者，其为政也，非贪即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众而得人鲜矣，官谤多而政声寝矣！^①

王禹偁强调“为学”“在于道义”，他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之后，即在于实践儒家的道义。“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重教”，王禹偁以极其明快的语言阐释了儒生士大夫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抱负，而且还要垂教于后世，使后继者接踵前进，更富有积极意义。这样，王禹偁把文章与道义、为学与从政，融合在实践中，是宋代士大夫第一个提出儒生们的共同愿望和目标的。

王禹偁继续发挥了韩愈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文传道而明心”，由此说明文字的重要作用。既然文字承担传道明心的重大任务，那么，文字的写作，“又欲乎句句传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王禹偁提出文字写作的一个标准，即：“句易晓，义易懂”，以明白通畅作为基本原则。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基本标准？王禹偁远以六经、近以韩愈文字为例，认为都是“句易道，义易晓”的，因此文字写作要以六经、韩文作为典范^②。

王禹偁把文、道和政治实践三者结合起来，成为其论文论世的一个基本准则。对王禹偁本人来说，他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言行是一致的。王禹偁所做的，也就是前面揭示了的，王禹偁为儒生士大夫提出的文道结合从而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实现那个目

①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四库影印本 1086—88。

② 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答张挾书》两篇，引文分别在 1086—156、157。

标。王禹偁四十八岁的一生，三次遭到贬逐以至于死，都是由于申论国事激起当权者的忿懣而造成的。贯串北宋一代的“冗兵”、“冗官”和“冗费”，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当其萌发于宋真宗即位之初，即被王禹偁的政治敏锐性予以洞察并向朝廷提了出来，为一般人难以企及。王禹偁的诗文，独步于宋初文坛，寇莱公称其“文章冠天下”^①。王禹偁的散文达到很高的水平，有的篇章，较诸欧阳修，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荆公谓：王元之《竹楼记》胜欧阳修《醉翁亭记》。鲁直（黄庭坚）亦以为然，曰：荆公论文，常先体制而后辞之工拙。^②

王安石提出的文字体制，指的是文字的全局，亦即所谓的规模、框架或结构。评论文字的优劣，首先应当从体制上亦即全局上着眼，这是确切无疑的。从体制上看，《竹楼记》似有一日之长。

王禹偁虽然致力于文风的变革，但对当时的影响还不算大。叶适曾对此有所评论，他指出王禹偁“文简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之者，而不甚为学者所称，盖无师友议论故也。”^③叶适的这个看法似乎还很不够。宋太宗、真宗时期，政治上不仅是极其保守的，而且是日趋腐败的，它所需要的是那些言不及义、粉饰太平的文章，而王禹偁的“多涉规讽”^④、针贬时弊、直斥统治者的鸿文高识，又怎么能够见容于这样一个时代呢？

王禹偁身后二十年，杨亿“以辞章擅天下，为时所宗”^⑤，影响最大。杨亿和刘筠，受李商隐诗风的影响，诗章中既寓存讽喻，在

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

②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六《文辨》，四库影印本 1190—456。

③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九。

④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⑤ 《宋史》卷二〇五《杨亿传论》，中华书局点校本。

表现形式上又重视词藻的雕饰,使王禹偁一代诗风为之一变。杨亿刘筠等的酬唱,收集在《西崑酬唱集》中,号西崑体。杨亿刘筠在诗歌方面是有所贡献的,但西崑体的仿效者则流于形式,从而成为宋真宗初年保守、腐败政治的赞歌,影响极坏。因此,批评西崑体,不能不触及杨亿这个西崑体的始作俑者,这也是在所难免的。范仲淹论述从杨亿到欧阳修这一期间文风变革的情况道:

洎杨大年(即杨亿)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词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饰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洙,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参军(指穆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歟?①

范仲淹的这段文字,对杨大年不能说无任何微词,但文字的批评火力则集中到杨大年的追随者身上,认为文风不振应当由这些人负主要责任。而反对西崑体,力图变革文风的则有穆修、尹洙和欧阳修等人。据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苏舜钦与其兄苏舜元也是有志于古文的,而且,苏舜钦的年龄虽然小于欧阳修,但习作古文则早于欧阳修②。此外,石介、苏洵也大约在这个期间习作古文③。总之,在宋仁宗天圣前后一批才华之士纷纷投身于文风变革的古文运动中,在散文诗歌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富有自己特色的贡献,成为文风变革的中坚力量。而欧阳修则是中坚的中坚,起着中流砥

① 《范文正公集》卷六《尹师鲁〈河南集〉序》,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苏氏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③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华书局点校本 1993 年版,第 116 页。

柱的巨大作用。

欧阳修习作古文虽晚于尹洙、苏舜钦兄弟，但后来居上，成为北宋一代首屈一指的大散文家。欧阳修幼年生活在汉东(襄州)，家境贫寒，从邻居李家藏书的一个破筐中找到了六卷的韩愈文，尽管这几卷韩文“脱落颠倒无次序”，却给年幼的欧阳修奠定了学习古文的根基。由于当时场屋崇尚杨亿刘筠辈的骈文，“号为时文”，欧阳修同其他举子一样，不得不认真诵习，以争一日之长。中举之后，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至西京留守钱惟演幕府中任推官，碰到尹洙、梅圣俞等才俊之士，方才开始了他的诗文生活。欧阳修等“相与作古文”^①，得到了尹洙的启发和帮助，并终于超过了尹洙和其他名士大夫，成为杰出的散文家。

同王禹偁一样，欧阳修的散文之所以写得好，同他的文论是密不可分的。欧阳修论尹洙的文字是“简而有法”^②。这个评论大抵可以作为衡量古文的一个标准。文字要“简”，但还要“有法”。这个“有法”也具有普遍意义，当然，它是因人因事的不同而表现为多种多样形式的。记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如果要想流传久远，“则须纪大而略小”，要“据其大节与人之所难者”^③。欧阳修这些话的意思是，对人对事，要抓住它的关键、要害、重点所在而加以论述，对一个人来说，不仅要抓住他的大节，而且这些大节是别人难以做得到的。除大节、要害之外，欧阳修很注重修辞，他说：

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表见于后世。《诗》、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三(外集卷三三)《记旧本韩文后》，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八《尹师鲁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③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九(外集卷一九)《与杜沂论杜祁公墓志》两书。已故的刘子健教授《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一书多所发明，本文参用甚多，仅此注明。

《书》、《易》、《春秋》皆善载而尤文者，故其传久远。^①

欧阳修就是按照他的文论要求来写作的。他把写成的文字，“贴之墙壁，坐卧观之，改正尽善，方出示人。”^②同时，非常重视别人的意见。据说，他的《岷山亭记》中的一句原作：“元凯铭功于一石，一置兹山，一投汉水”，年青而又才气纵横的章惇向欧阳修指出，这句话过于突兀，不好上口，不如改作：“一置兹山之上，一投汉水之渊”，从而得到了欧阳修的首肯，并用以改正的。一首好诗要呕心沥血，一篇好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欧阳修在文章写作上是耗尽力气的。

为了变革文风，欧阳修自己努力写作，还大力奖勉、提拔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轼辙父子等，都受到欧阳修的鼓励和赞誉，苏轼苏辙兄弟则是通过欧阳修主考科举时中举的。欧阳修以及曾巩等五人，加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谓之唐宋八大家，宋则占其六。这说明了，正是通过文风的巨大变革，才涌现出有重大成就的人才。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借着这个极其有利的时机，欧阳修对一些“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③，文风不正的考生们大肆挞伐，“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几尽”，“务求平澹典要”^④。落第的考生，“群聚诋斥之”，“怨怒笑骂”，“至街司逻吏不能止”。变革文风是一个群众性的活动，如果场屋中的考生们也改变自己的文风，它的影响就带有某种程度的广泛性，对文风的变革是极其有利的。欧阳修在知贡举中虽然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然而场屋中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七(外集卷一七)《代人上王枢密求见集序》，四部丛刊本。

② 何薏：《春渚纪闻》卷七。

③ 吴充：《欧阳修行状》，《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一。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纪事；《欧阳修行状》。

的文风则通过这个不大不小的政治风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文格遂变而复正者,公之力也。”从柳开王禹偁到尹洙欧阳修,经过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文风的变革以胜利告一段落。欧阳修在文风变革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但文风变革不单纯是文体的变革,从骈体改为散体,更重要的是,在于内容的变革。即变革文风必然要同宣扬儒家之道这一实质性问题关联起来,而宣扬儒道就必然同经学探索关联起来。于是文风的变革便同学风的变革关联、结合起来了。

二、在经学的探索中欧阳修的大胆怀疑精神

欧阳修同所有的儒生士大夫一样,都是“修仁义以为业,诵六经以为言”^①的。但,欧阳修真正用自己的头脑诵习六经,则是在天圣九年(1031)任职西京幕府时开始的。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摆脱时文的羁绊而学习作古文。在时代的推动之下,青年的欧阳修把文风和学风的变革,统一在此后十多年的实践中。

宋初依然因袭唐代科举制度,考生们必须遵照官修《五经正义》等传统的传注回答试卷,不许有任何违背的地方。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一位考生考卷上因“与注疏异”而下第,当时参加政事王旦对此事作出了结论性评论道:“舍注疏而立异论,辄不可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②传统的传注,从两汉经师们的解经到孔颖达《五经正义》,如前章论述过的,率多陈陈相因、支离破碎,早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至唐中叶还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所具有的统治地位也开始动摇。欧阳修就是在这个时刻用自己的头脑诵习、探索六经,积十多年的努力,获得了自己的看法。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四《归田录序》,四部丛刊本。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景德二年三月甲寅纪事,中华书局点校本。

“六经皆载圣人之道”^①，欧阳修极其自然地重视六经。根据他自己的认识能力和理解，欧阳修认为六经是：

《诗》可以见夫子之心，《书》可以知夫子之断，《礼》可以明夫子之法，《乐》可以达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②

从对六经多年的探索中，欧阳修认为六经的论述都是极其“简要”的^③。尤其是《易》和《春秋》两部书，是所谓的“夫子之文”，“其言愈简，其义愈深”的^④。六经虽然言简意深，但是由于出自于圣人，“在人情不远”^⑤，并不难于理解。传者，传也，是用来转述传解经旨的，经过欧阳修的探索，经固然有不索解的，传却给人们增添了更多的麻烦，如欧阳修所指出的：

经不得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⑥

为什么会造成传不能解经这个重大问题？欧阳修认为，是孔子殁世之后，由一些传注的儒生们造成的：

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殁，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自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二《送王陶序》，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外集卷九）《代曾参答弟子书》，四部丛刊本。

③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〇《试笔·六经简要说》，四部丛刊本。

④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八（外集卷二八）《〈易〉童子问》第三卷，四部丛刊本。

⑤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九（外集卷一九）《答宋咸书》，四部丛刊书。

⑥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八《春秋或问》，四部丛刊本。

汉以来，莫或辨正。^①

为什么儒生们把一些与经相矛盾的说法混杂到传疏之中？欧阳修长于《春秋》，他以三传（即公羊、谷梁和左氏传）为例，指出三传作者务新好奇，混杂进来，以至经传相矛盾而不得其解：

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经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②

欧阳修在《春秋论》、《春秋或问》、《左氏辨》诸文中一再提出三传好新奇的问题。他还以司马迁《史记》作为好新奇的一个例证加以批评。是的，司马迁在记述某些人物和事件时，往往罗列各种说法，似乎是有些务新奇。司马迁之所以如此，提出不同说法以供比较，他自己则对各种说法有自己的见解。在对古史材料取舍方面，司马迁提出了一个选择的基本原则，即“考信于六艺”，以六经的记载为准则。欧阳修虽然批评司马迁好新奇，但他在解决经传记载歧异这一矛盾时，完全以六经为指归，所使用的辨证材料的方法，与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欧阳修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是受了司马迁的影响。

儒生们之务新好奇，给六经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严重的是，不少荒诞怪妄的谬论也都混杂进来。欧阳修曾举出，“如河图洛书尤怪妄之甚者”，也一道混杂进来。因此，欧阳修极其感慨地说：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八《秦誓论》，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八《春秋论》上，四部丛刊本。

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①

这一书序，是欧阳修于嘉祐六年写成的。较其他论学的文章稍晚，但非常重要。序文中提出的河图洛书一事，须作说明。按河图洛书，载之于《易》。《论语》上所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是孔夫子亲口说的，与河图洛书之义完全相同。肯定地说，欧阳修是知道的。但欧阳修之所以不把这种“怪妄尤甚”的谬说归诸孔夫子，主要是为孔夫子讳，这一点勿须对欧阳修多加指责。要紧的是，不论归诸于谁，欧阳修对这种谬说一直采取坚定的批判态度，后面再作说明。

欧阳修不仅对传疏提出许多疑义和责难，对经同样地提出了疑义和责难。在《〈易〉童子问》卷第三，欧阳修明确地指出，《系辞》、《文言》、《说卦》等等，都不是孔夫子所作：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覆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②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点，六经出自于孔夫子，具有绝对的神圣地位和

①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三《廖氏文集序》，四部丛刊本。

②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八《〈易〉童子问》卷第三，四部丛刊本。

权威,是不能够轻易冒犯、亵渎的。即使象韩愈这样的儒生士大夫,对六经也不敢说个不字,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一句,即表现了这种情况。欧阳修却不怕犯天下之大不韪,在“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的大胆怀疑精神支持之下,向《易》提出从来没有过的挑战,认为《系辞》、《文言》、《说卦》统统不是孔夫子的著作,而是学《易》者们将这些东西混杂到《易》经中,成为鱼目混珠的贗制!从学术思想发展史或经学思想发展史看,对六经提出怀疑的,不过是有数的几个人。东汉王充应当是其中的一个,而欧阳修也是其中的一个。并且是宋代疑经的第一人。欧阳修对《易》经提出的挑战,不仅是惊世骇俗,给抱残守阙、学术上的守旧势力以当头棒喝,而且在这种学风感染之下,学术上的自由探索日益扩展起来,对学术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总之,欧阳修对经学大胆怀疑,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学者,对宋学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以无比的执着、自信,再加上某种程度的自负,坚持他所提出来对《易》经等的许多责难是正确的,而且必定能够得到世人的公认:

自孔子歿……六经于是中绝。汉兴,盖久而复出,其散乱磨灭,既失其传,然后诸儒因得措其异说于其间。为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余尝哀夫学者知守经以笃信,而不知伪说之乱经也。屡为说以黜之!而学者溺其久习之传,反駭然非余以一人之见决千岁不可考之是非,欲夺众人之所信徒自守,而世莫之从也。余以谓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岁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又二千岁焉知无一人焉与修同其说也,又二千岁将复有一人焉,然则同者至于三,则后之人不待千岁而有也。同予说者既众,则众之所溺者,可得而夺也。……是则余之有待